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中國詩學研究

第7辑

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专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中國詩學研究

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专辑

第⑦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学研究·第7辑，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专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212 - 03435 - 1

I. 中… II. 安…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②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25 号

中国诗学研究 第 7 辑 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专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0551 - 3533258 3533268 3533292 (传真) 邮编：230071

组 编：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 话：0553 - 3883578 388357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安徽芜湖新欣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0 字 数：251 千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3435 - 1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诗学研究》

学术顾问：傅璇琮 刘学锴 莫砺锋 钟振振
 邓小军

编 委：丁 放 余怒诚 胡传志 潘啸龙
 谢昭新 陈文忠 汪裕雄

主 编：丁 放

副主编：胡传志 潘啸龙 谢昭新

《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专辑》

本辑执行主编：丁 放



目 录

古代诗学的现代转换

李白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影响	余恕诚 程宏亮 (1)
“五四”以来传统诗词综论	刘梦芙 (18)
“以文为诗” ——宋诗传统在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简论	吴怀东 (39)
试论古典诗歌对 20 世纪新诗的负面影响与影响焦虑	杨景龙 (49)

走近现代的古代诗学研究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怨	邓乔彬 (80)
从明代词选看词学观念的演变	丁 放 葛旭芳 (99)
《词菁》与《花庵词选》比较研究	曹秀兰 丁 放 (119)
论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审美现代性特点	杨柏岭 (132)
唐代试律诗：称名、类型及性质	彭国忠 (156)

走近古代的现代诗学研究

读《尝试集》兼论中国新诗的“尝试”	邓国伟 (174)
论朱湘的诗学思想	谢昭新 (187)
刘征诗词：古韵出新声	张应中 (202)
从“边缘”切入：对峙中的回归 ——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为例	黄万华 (221)

诗学综合研究

旧体诗词的韵与命	张海鸥 (231)
从一个“瘦”字看汉字精神 ——兼谈新诗语言取向	姜耕玉 (240)
审美心官论	陶礼天 (243)
诗词创作三题	周啸天 (267)
论骈文与律诗的语言形式之现代性特征	江弱水 (274)
试谈诗词教育的人文化成作用	杨景龙 (293)

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

.....	程宏亮 丁 放 (311)
-------	---------------

李白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影响

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郭沫若曾将其与杜甫并称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融合庄子和屈原的艺术传统为一体，形成雄奇豪放的诗风，对后世许多文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韩愈、李贺、苏轼、辛弃疾、陆游、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而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一生更是情系李白，引为同调。

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致信宗白华：“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①充分肯定李白歌行有如“大波大浪的洪涛”般的“雄浑”，信中认为这样一种诗风对“五四”时期诗歌创作具有借鉴意义。1928年3月郭沫若回忆童年所受古诗影响，曾言：“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② 1941年9月诗人在论述“诗的韵脚和分行问题”时^③，就曾引用他喜爱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修饰”^④来阐述诗韵的适度问题。1961年9月曾模仿

①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② 《沫若文集》第六卷《少年时代·我的童年》，转引自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③ 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④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原文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蜀道难》创作《蜀道奇》，题下有序：“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① 1962年3月诗人在“论新旧诗的欣赏与创作”时^②，举李白广为传诵的《静夜思》来论证欣赏古典诗词不能只强调斗争的一面。同年3月诗人就其少年所受影响再次强调：“至于唐代的几个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③ 1964年5月5日诗人踏访李白晚年钟爱的采石矶，兴发感叹：“李白就是李白，心胸坦荡以山动情，寓江流觞，真情流露，毫无伪装，诗言其志，荡气回肠！”^④ 并欣然题诗《漫题采石矶太白楼》：“我来采石矶，徐登太白楼。吾蜀李青莲，举杯犹在手。遥对江心洲，似思大曲酒。赠君三百斗，成诗三万首。红旗遍地红，光辉弥宇宙。”另作词《水调歌头·登采石矶太白楼》一首。在一诗一词中，诗人满怀豪情地抒发与李白同源“吾蜀”的自豪，赞叹李白的才情，歌咏采石的江山形胜以及新时代风采。诗人喜爱李白还突出表现在他对李白诗歌的研究上，1971年曾发表专著《李白与杜甫》^⑤。该书尽管扬李抑杜倾向十分明显，对李、杜思想及诗歌的认识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同时亦可见其对李白的倾慕之情，有些地方甚至隐隐以李白自况。书中关于李白出生地、李白政治遭遇、李白诗歌艺术，还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

当然，有一点需要说明。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伟大开拓者，创作于“五四”时期的《女神》《星空》《瓶》《前茅》等诗集，

① 林东海、史为乐选注：《郭沫若纪游诗选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郭沫若谈诗》，《文汇报》1962年3月29日。

④ 杜和题、黄双喜主编：《诗润“江东第一城——著名诗人在马鞍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以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由于“五四”狂飚的精神，重点在于“破”，在于革新，因而在诗歌传承上，郭沫若并未强调自己曾接受的古代传统。“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是当时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就诗歌创作言，当时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冲决旧体诗森严格律的罗网，向自由的新诗迈进。鉴于此，作为新诗倡导者、实践者之一的郭沫若，自然很难直接提出要学习古典诗歌优良传统的命题，也很难强调包括李白在内的古典诗人对他产生的影响。但是，决不能借此否认李白对其“五四”时期诗歌的影响。建国后郭沫若曾多次明确主张诗人应兼收中外优良传统，“作家们必须虚心一点，努力地向古典的优秀诗歌学习，向外国作家学习，来充实我们新诗的成果。”^① 向古典诗歌学习，即使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也是存在的，只一般不见于口号和宣传而已。今天学界也认为，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浪漫特色不仅与海涅、雪莱、惠特曼等外国诗人的影响有关，“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②。只是对于李白影响何在，研究不够深入而已。本文拟就此发表一些粗浅意见。

一、叛逆精神

呈现“自我”是一般抒情诗的共同点，但在表现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李白和郭沫若的诗歌，在表现自我方面，特别突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举杯邀明

^① 《雄鸡集·谈诗歌问题》，《沫若文集》，第17卷，第269页。收入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四首》其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此为李白笔下的“自我”：胸怀博大、力量巨大、气魄宏伟，能与月和影共酌，不仅物我无间，而且情感狂热。“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炉中煤》），“火便是你/火便是我”（《凤凰涅槃》），“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天狗》），郭沫若自喻为煤、火、天狗，赤诚、热情，充满着对光明的憧憬，蕴涵着巨大能量。李白和郭沫若显然都是“主观之诗人”，一连串的“我”，足见诗人的浪漫情怀。“自我”既体现各自的浪漫气质，又超越现实关系中真实的“我”，具有鲜明的诗化个性色彩。

结合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表现，李白的“自我”与郭沫若的“自我”，构成联系的是具有叛逆性的特征。时代不同，具体内容不同，李白所不满和抨击的对象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秩序，郭沫若所反抗的是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虽非同一时代的人和事，但矛头都指向反动腐朽的恶势力，而前后异代的两位诗人，都属于贯通于中国历史上的推动进步的一方。其中的联系和发展，可以简单地说成是从“狂士”到“匪徒”。

李白对当时的权贵、宦官、军阀，以及各种卑鄙龌龊的“小人”非常憎恶。跟这些丑类所形成的恶势力始终处在对立地位。他不能与之共处：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他骂气焰嚣张的宦官和受皇帝宠信的斗鸡者为盗贼：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古风》其二十四

骂颠倒黑白、谗言害人的小人为“苍蝇”：

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他一腔愤怒与牢骚，寻求发泄，甚至到了要爆发的程度：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趁人意。……我且为君
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

——《江夏赠韦南陵冰》

正因为他是这样地对压抑着他，同时也是窒息着、笼罩着整个社会的黑暗势力，予以无情抨击，具有巨大的冲击力量，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不能容忍他，视之为“逆”。

世人皆欲杀！

——杜甫《不见》

几乎要置之于死地；或者制造种种流言蜚语、捏造种种恶名加以陷害：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傥黄祖过祢，晋帝罪

阮，古无其贤。

——魏颢《李翰林集序》

简直要诬之为杀人犯，或者认为是像嵇康（叔夜）、祢衡一样破坏名教而应该处死的人。

总之，在封建统治者眼里，李白是一个“狂士”^①，是一个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人物。

20世纪前期的郭沫若，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的人物，而且可以说他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贰臣逆子走向革命的志士。他是20世纪初中国反帝反封建新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集《女神》，鲜明地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叛逆、反抗、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真理、狂飚突进，是这部诗集的主旋律。其中的《匪徒颂》，歌颂古往今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向他们三呼“万岁”。这些“匪徒”实际上是叛逆者、革命者；作者自己也认同、追随这些“匪徒”。郭沫若甚至不惜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毁坏旧世界、追求民族的解放，国家的新生：“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棠棣之花》）他运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凤凰涅槃神话，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凤凰涅槃》）。凤凰在烈火中再生，比喻燃烧掉旧世界，才能创造新的世界，新的自我。郭沫若对于黑暗的批判、斗争，比李白更强烈、更尖锐。时代不同，但从“狂士”到“匪徒”，叛逆精神有相同之处。

^①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李太白狂士也。”

二、摆去拘束 破旧立新

不仅在反抗旧秩序的政治表现方面，李白和郭沫若可以联系起来；在诗歌创作方面，追求革新，追求“摆去拘束”^①，大胆创造，两人也有相近之处。

李白走上诗坛的时候，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文风之弊还没有得到清除，李白继陈子昂之后，更高地举起诗文革新大旗，认为“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②表现出以挽衰救弊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勇气。他的组诗《古风五十九首》开篇即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等于是一篇诗歌革新宣言。李白在其他一些地方，对六朝的谢灵运、谢朓、鲍照等人是肯定的，在实际创作中也吸收了六朝诗歌的精华，但在这篇宏观性的诗歌评论中，总体上对六朝的浮靡诗风是否定的，要恢复《诗经》的文质彬彬的传统。这正是一种不苟且姑息的革新精神。他的笔力足以表现他的非凡气概，

①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予观其（按：指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② 见（唐）孟启：《本事诗·高逸》。

他喜欢包括乐府歌行在内的七言古诗。这是在初唐四杰手里已经有了一番改造和开拓的诗体，而到他和盛唐诗人手里，更是破骈为散，极尽变态，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少约束、最富有容量的一种体式。它亦歌亦诗，亦文亦赋，篇幅可长可短，语言灵活自由，声韵变化自如。李白藉以放笔驰骋，发扬才思，开合纵横，创新出奇。李白喜欢的另一种诗体是绝句，绝句也是非常自由的诗体，在李白那里往往信口而成，真纯自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说：“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又说：“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子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谁家玉笛暗飞声’、‘天门中断楚江开’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可以说，正是由于李白等人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上都贯彻了变革创新精神，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实际成绩，因而得以真正完成扫荡六朝浮靡诗风的历史任务。李阳冰《草堂集序》云：

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

李白诗歌使用的是在盛唐时代堪称自由解放的诗体，其创造精神和新变能力对 20 世纪初叶的郭沫若来说，有着启示意义。诗歌革新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大课题，形式上要求破除各种旧的束缚，胡适、沈尹默、刘大白等都率先开拓，但力度不够，旧诗痕迹依然明显，直到郭沫若《女神》问世，白话诗体变革才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早期新诗，实为不同于旧体诗的“自由体”，没有固定格律，不受声韵拘限，激情

澎湃，气势飞扬，如《晨安》《光海》等。也有一小部分诗歌形式格律较为严谨，如《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就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但全诗在整体上也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郭沫若“五四”时期曾提出“自然流露”说^①、“内在律”说^②以及“无所谓目的”理论^③等。“内在律”注重诗歌内容与抒情自我的心理交融，注重内在旋律和诗人情感的契合。这是古今好诗的共性，李白和郭沫若的代表作都是如此。“自然流露”说如其所言，“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新体诗的生命便在这里。”^④此说接受了南朝梁钟嵘《诗品》和唐司空图《诗品》的影响，“司空图对‘自然’风格的品评，显然是郭沫若‘自然流露’说的理论渊源”^⑤。崇尚自然美是盛唐诗坛反映出来的一种倾向，司空图诗论中的“自然”一品，其心目中的样板正是李白和盛唐诗人之作，故郭氏“自然流露”说与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之艺术理想暗合。周扬曾高度评价郭沫若创作自由诗的革新之功：“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括的‘五四’战斗的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

① 参见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④ 吴奔星、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⑤ 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式上，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① 郭沫若也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开拓新诗歌的路》1948年1月31日）^② 可见，郭沫若的理论主张和诗歌实践，与李白有相通之处，其在诗史上的革新功绩，也与李白先后相映。

三、时空意识

李白与郭沫若在创造诗歌境界时所体现的时空观，呈现接近浪漫主义的特点。宇宙时间永恒，单向运动，不可倒流；宇宙空间定位明确，循规而动，不可任情迁转。但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诗人，在观察时空的方式上，往往不守人与自然的客观故常，主观意识强烈，重在艺术虚构，其诗境时空更多的体现为自由流动性、任情超越性。李白与郭沫若笔下的艺术化时空，体现出较多的共同性：雄阔浩瀚的气势，力度强，能量巨，物随情移，诗思穿行于天、地、人之间。

李白诗境浩瀚辽阔，有吞吐山川日月的气势，皮日休说他“五岳为词锋，四海作胸臆”（《李翰林》），又说“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③ 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月出峨嵋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嵋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描绘高远、辽阔的境界，天地人织入其中，交流互动，形成高大雄伟、超出人寰的宇宙境

^①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② 《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③ 《刘枣强碑》，《皮子文薮》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早发白帝城》）、“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难》），高远、阔大的诗歌境界，给读者振奋人心的速度快感！郭沫若诗歌气象与李白浩瀚博大的宇宙境界是相通的，在广度、高度、深度、远度、速度等多重纬度上都体现出开阔、高远的特征。《晨安》写诗人站在日本博多湾畔，遥望蓝天、白云、大海，感受晨风，思绪飞扬，一口气送上 27 个“晨安”；大海广阔深远，白云高远涌动，旭光照彻天地，长江奔腾浩荡，华盛顿、林肯威名远扬。气势恢弘，诗境雄阔，有宇宙气魄。《新生》创作于郭沫若归国途中，回忆乘坐火车的生命感受。主要意象是雾、地球、火车、太阳。地球呼吸着朝气，境界辽阔；火车向太阳飞跑，气象高远；速度和力量美感毕现，“向……向……/向……向……/向着黄……/向着黄……/向着黄金的太阳/飞……飞……飞……/飞跑，飞跑，飞跑”，急促的短句、飞奔的气势，都体现了速度之美。

郭沫若和李白都以宇宙意识为创作的心理基点，高扬人在宇宙中的主体精神，二人诗中的“宇宙”境界所体现的力度、能量，以及诗人观察时空的视角，都有诸多相似性，如李白《天马歌》云：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兔。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羈金络月照皇都。逸气稜稜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

天马实际上是李白的化身，但它不像凡世的人受时空限制，